

邓云乡 著

水·流·云·在·杂·稿

水流云在
杂稿

北岳文艺出版社



1206.
119

邓云乡 著

水·流·云·在·杂·稿

水
流
云
在
杂
稿



北·岳·文·艺·出·版·社



10008270



水流心不競 雲從意
 俱遲世味苦猶應得
 襟妙 志公署出原
 拙計問道更誰師
 吾愛杜陵老 江干野
 坐時

未申之宵看雜事

校樣未竟忽奉海外友人
 寄書存意新什致職小
 訪題於卷首鄧堂鄉



师教择抄（代序）

（按语：本书所收各文，均系在三中全会之后，安定团结大好形势下所写。不少均系在旧日师长关怀、教诲之下写成。其间与俞平伯老师通讯最多，现择抄平伯夫子赐函中与本书所收各文有关之教言，用代序言。云乡敬志。）

复书欣诵，屡承转信为荷。海上交游，颇不寂寞。如晤从周，乞告以拙作《书带集序》将于《学林漫录》第四期刊出，已看到校样。……从《集刊》四辑，得读大作《诗学传薪》，论述详明为欣。

（按：《集刊》指《红楼梦研究集刊》）

手书及《江淮论坛》收到，此文可用。所谓《学林漫录》载大文之校样迄未见到。观文题《日记残稿》，此二字何指？若指游杭州日记，则非残稿，乃光绪壬辰年单行本也。希示及。

承手书藉谘上海近况……《词学》创刊号尚未得见，估计前途，困难不少，以此道衰微，视昔尤甚。若报刊所载，每安一词

牌名，而内容“浑不似”也。若论词之作，拘泥缭绕者多，惬意费当者少。我自病其多而寡要……李易安《声声慢》“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评者谓“黑”字不许第二人押者，近修改旧诗，偶而想到此乃暗用《老子》“知其白，守其黑”而分为两句，口语流美。令人不觉耳。我前编《词选》，亦未想到，附书博笑。

手书及新作均诵，我前寄一函，内附诗稿，似未收到，或迟到欤？前示五古甚佳，以转示黄君坦先生，有“畅达清隽，具见学力”之评，非泛辞也。《烹饪》杂志所载大作已得读，画像未写过，不知谁所画。又文中引《忆京都》词，集中未收，我亦从未见，词亦不下列“牌”名，恐非老人所作也。

（按：《烹饪》指《中国烹饪》）

尊注《颐和园词》不知刊于何处？盼得一观。想是王作，曾于《观堂集林》中见之，于西后颂多于刺，尚非史笔。兄谓如何？近于“南大”油印本汪文见瞿兑之之歌，亦咏其事，未知见否？

（按：“南大”不知为南京大学抑为南开大学，从未写信问明。）

两书收到，大作已读。……注释颇佳，详瞻便于阅读，亦不免讹字，（正文为要。）定本或较好。王作首句“汉家七叶钟阳九”，与陈寅恪歌“汉家之厄今十世”同。以“汉”喻“唐”，常语也。如《长恨歌》，以之比满洲，恰恰相反，有妨春秋之旨，今所谓民族主义，不免遗老口气耳。又诗中有“新锡山名呼万

岁”句，或暗用典，而不合事实。“万寿山”、“颐和园”，已成今之口头语。尊注既已驳正，（甚好。）似不必更为之回护，转恐讹谬流传，以二者为同时命名也。

（按：上文加括号处，均为原信中注在句旁之语。

为便于排版，特于择抄时加括号写在文中。）

两书次第得诵，新词流鬯，想见意兴之佳，郊居之乐。旧集知先另购得，弥见垂青。尘羹土饭而书品尚佳，讹错甚少，近亦希见。“草”原是草稿意，而友人来书引李太白“燕草碧如丝”，则一语双关，“燕草”亦有书典，为俚辞生色多矣。

（按“旧集”指新影印之《燕知草》）

开春将审定职称，近来足下著述风行，定卜如意，可以预祝。并得读《牛年二律》，均甚佳妙，非泛泛打油，清兴不浅。自宜刊诸日报，俾众同赏。我近体粗安，只更衰弱，写二信即费一上午（以动作迟缓，易误），别提写作了。

（按：《牛年二律》后刊于上海新民晚报副刊。上文括号信中原有。）

目 录

1	代序
1	日记文学谈丛
21	静安先生《颐和园词》本事
52	罗振玉写印本《颐和园词》跋
56	《红楼梦》诗学传薪说
71	《红楼梦》与民俗学
97	曹雪芹园冶构思探秘
104	易安居士送别词蠡测
114	《水浒》人物造型
130	《桃花扇》历史和艺术
147	“八股文”三问
175	汪辉祖及其著述
195	《北平笈谱》史话
227	清代物价三百年述略
267	《苏园花事词》说
287	北京俗曲与北京风俗
320	陈师曾艺事
331	林琴南文学艺术

349	读《曲园日记》
358	广和居小志
378	缪艺风与友朋书札
391	圆明园古籍二种
409	《旧都文物略》小记
420	五石居士藏影
429	李清照词简说
504	后记

日记文学谈丛

我很爱读前人的日记，我感到日记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学体裁。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生是短暂的，历史是无穷的，世界是广阔的，不要说“古人”、“来者”不能见到，即使是同时代的人，住得很近的人，又有几个能成为可以互通心声的好朋友呢？即使是交友遍天下的人，而能经常朝夕相处、言谈欢笑的朋友也是不多的。因为各人有各人忙碌着的世事，各人有各人生活的场所，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爱好，是不可能总在一起的。至于一般的人，那接触的朋友就更少了。即使仰慕“名人”，想同他们来来往往，但又常常是相隔云泥，高攀不上。勉强凑凑，也只是热肚肠碰着冷白眼，自讨无趣罢了，这又何苦呢？而在读日记时，却可以打破这种种界限了，既不管时代的今古，也不管位置的高低，只是把他的日记摊在面前，读下去，读到会心处，真如看到他的人，听到他的声音，和他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之中，成为

极熟的朋友一样了。

比如南宋的范成大，生活在十二世纪，离开我们已八百年来，从时代上说，我们很难想象他的面容和为人，更不要说和他作朋友了。再说他当时的官职作到资政殿大学士、成都制置使等职务，即使在当时，一般人也是很难高攀的。但我们一读到他的日记中显露性格的地方，马上便有活的范石湖出现在眼前的感觉了。淳熙丁酉（一一七七）他罢成都制置使回苏州，道经武昌，官船停泊，当地的官吏都来见他，请他吃饭，他在“排日记事”的行纪《吴船录》中记道：

辛巳晨，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闭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监司帅守刘邦翰、子宣而下，皆来相见邀饭，皆曰未敢定日。及欲移具舟次，余笑曰：“若定日，则莫若中秋；张具，则莫若南楼。”众亦笑许。

这则简洁的日记，不只是给我们生动地记录了八百年前武昌繁盛的市容和富庶的金融情况，而更生动地记录了这位大帅路过时的情况，“余笑曰”几句，文字虽然不多，却有“颊上三分”之妙，把当时的气氛活生生地写出来了。这位制置使的豪爽的性格，高尚的生活情趣，融洽的友谊气氛，都浮现在读者的眼前，真象是听到他的笑声，看到说话时的神态一样。

再比如近代的林则徐，离开我们也已一百四五十年了。林则徐官作到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不要说今天，在当时要想见见这位林大人，也是十分不容易的。想接近他，和他作朋友，那真是谈何容易呢？但如果细细地读他的日记，那情况马上便两样了，

一切距离便会缩短到最小限度，你便可以理解他的中年、老年，你就会变成很熟悉他，知道他个性的老朋友了。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二月二十五，日记道：

二十五日，戊午，阴，上午将军贡差来，接十月二十五日家书一封，刘敬余一信。午后抚署折差来，又接十一月十三日家书一封，张中丞一书。并夏肇东、沈荫士、李兰卿、陈二舅、杨雪椒、郑倬亭诸书，晚又接清江郑文轩之信。是日双鱼竞达，笺翰纵横，快同晤语，然持笔作达，亦倍觉劳矣。

这还是林则徐外放之前，在北京翰林院作庶吉士的日记。林则徐在发达之前，就是以精明能干著称的，道光三年十一月初九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京引见时，道光帝说他：“汝是精明的人，要不自恃精明……”上述日记则写他年终时收到许多信件，忙于作答的情况，也正显示了他在发达之前，年轻有为，精明强干，交际频繁，踌躇满志的得意形象。从日记中我们好象看到他那手不停挥地忙于写回信的神态一样，这样你就非常熟悉这位林大人了。

再如鲁迅先生，现在虽然当年与先生有过往还的人，不少都还健在，但究竟年代也很久了，六、七十年前和先生往还的熟人，在今天恐怕也真如凤毛麟角之少了。因而我们今天单从人的接触上，也是很难生动地想见鲁迅先生早期的亲切形象了。也只有细细读先生的日记，才能使我们较形象地想一下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一九一七年正月二十二日记云：

二十二日，晴，春假。上午伍仲文、许季市各致食品。午前车耕南来。下午风，许季上来，并贻食品。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这年是民国六年，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两年，当时北京人过

“年三十”，黄昏上灯之后，正是接神的热闹时刻，不要说别的，单是街坊四邻放“二踢脚”的火爆声，就能嘈得你心神不安了，何况是住在会馆中的只身羁客呢？而鲁迅先生却能际此京华除夕夜，一个人坐在宣南古老的山会邑馆小室中，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安静地录碑，这种特殊的镇静，不是客中的寂寞，而正是伟大的行动前的片刻的宁静。“殊无换岁之感”，不是宁静地忘去了岁月，忘去了人生，而正是集中地、深沉地思考岁月和人生的时刻。

我以上举了三位先贤的三则日记，真可以说是沧海之一粟，不过如果说从一滴水可以看到世界的话；那么从一则日记中，往往也能看到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这是从任何列传、家传、外传、别传、事略、墓志铭、以及本人的诗、文等著述中得不到的。这是因为日记的特殊体裁所决定的。日记的特征是排日记事，记下主人每天的生活情况，一般来说，原来不是当作著作的，也不预备给别人看，因而它文字上并不着意修饰，只是根据写者当时的思想感情、文采水平信笔记下来的。如果作者写时那天兴致好，事情多，文思泉涌，信笔写来，都能成为极好的文字；反之，如果那天因特殊原因，作者情绪极坏，那就写得极少，甚至写上“无事上记”，或者干脆不写（当然这是指习惯于坚持写日记的人说的，根本不写、或间或写的人不在此限），读者于这种地方，同样能看出作者的活生生的形象，听到作者的心声，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读《林则徐集》日记分册，知道这位林文忠公当年是坚持写日记的，每天都记得很清楚，可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零）十一、十二月日记中，则有许多天都是“没字的”，只记日期、干支、阴晴，如十一月“朔日，丁亥。晴”，“初五日，辛卯。晴”等等。这

些日子里，作者虽然只字未记，而于这些突然的无字处，不更可以听到时代的滚滚风雷声，看到作者内心激动的神情吗？

日记对其作者说来，虽然是随手札记，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着意经营，但在名家笔下，往往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一样能写出十分优美的文字来。而且文字这样事，说也奇怪，常常是和人的品貌态度一样，随随便便倒很好，有意做作反而不好。在写日记时，写景、抒情，潦潦几笔，倒真能写出感人肺腑的文字，其功力绝不在宏文高唱之下。下面也随意举几个例子。陆游《入蜀记》乾道五年闰五月廿八日记云：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阊门，买小舟泛西湖，至长桥寺。予不至临安八年矣。湖上园苑竹树皆老苍，高柳参天，僧寺益葺。而旧交多已散去，或贵不复相通，为之叹绝。

六月八日记云：

八日雨霁，极凉如深秋，遇顺风，舟人始张帆。过合路，居人繁夥，卖鲜者尤众。道旁多军中牧马，运河水泛溢，高于近村地至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妇人、儿童竭作，亦或用牛。妇人足踏水车，手犹绩麻不置。过平望，遇大雨暴风，舟中尽湿，少顷霁，止宿，八尺。闻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卖鱼颇贱。蚊如蜂蛰可畏。

第一则只有三行多，不足百字，但叙事、写景、抒情样样俱到，且寓意深远，感慨良多，放翁八十年来万首诗，是以诗传世的，但这则小日记所表现的意境，则又是和诗韵味迥殊的，是诗所不能表现的了。第二则是象一幅江村盛夏风景画一般的散文诗（不过我国古代无此名），如果写成歌行、乐府自然也可以，但那韵味又会是两样的。正因为是作者旅途所记的日记，未事雕琢，所以更加使人感到有一种文字上的自然美，真可以说是历历

如绘了。

在近代，日记写得最漂亮的是李慈铭。他的连续三十五年的《越缦堂日记》和《越缦堂日记补》，皇皇六十余册，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日记中的绝代巨著。虽然鲁迅先生曾说：“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但这也不能据为定论，它的历史文献价值，还是要给以充分肯定的。李越缦由绍兴到北京，一住几十年，摆名士架子，目空一切，看不起人，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他勤于读书、著述，把日记当成传世的大著作来写，并且才华过人，文字优美，因而在日记的写作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里随便引几小段，看看名士的内心世界和他的优美文字。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记云：

初三日，丙申，未初三刻夏至，浙江未正初刻，上午晴，大热。……子恂来。午雷雨，顷止。秋蒿来。与麋叟谈。傍晚偕未云登平台，骑屋脊望西山，远绿如抹，时乱云景凤城，浓树远近，鬟绕粉墙，踞踞高下接比，不复知有软红十丈矣。

初七日记云：

初七日，庚子，味爽雨作，终日萧槭作声。时有薄阳，庭院树石晚净幽旖，益耐寻赏。傍晚小雨，倚徙碧阴，或据槁木，或憩孤石。觉寻丈间地，宛然有濠濮上想。叔子谓吾两人得此小室，不减深山。余谓今日有三事最难得，夏日得雨，都中得闲，京师尘埃中得小园林。便为奢愿具偿，新赏无纪，又非凤具烟霞瘴疾，泉石性灵者，未能语此也。

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三日记云：

初三日，庚申，早雨，上午阴，下午薄晴，凉可著夹衣。……日来贫甚，今晨命奴子卷絮被质钱十五千，适阿月

携武进臧玉林先生《经义杂志》一书来，遂以购之。昔吾家元忠令婢卷得贗酒，时人叹其率素，若仆者，可谓不坠家风矣，书此一笑。

《越缦堂日记》卷帙浩繁，无法精选举例，这只是随手引几则，以尝鼎一脔。不过就是这一点也足以看到作者的“心”，第一则骑在屋脊上看西山，第二则论三事难得，第三则当了棉被买书，都自有其率真处，而不是写了骗人的事。总之李越缦有才华、有学问，恃才傲物，不免偏激。加以功名心切，而偏又文战不利，仕途坎坷，早年连个举人也考不中，只能入赘为郎，直到光绪六年才成进士（同治九年回浙江考中举人），已经五十三岁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既有一肚子不平，但又急于想在科举、仕途中出头，所以他尽管到处骂人，十分刻薄，但对最高层皇帝宫廷中的政治变化，他却是十分谨慎的。鲁迅先生说他的日记“一是抄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这真是看到了李越缦的心曲。李在日记中不但抄“上谕”，抄“宫门抄”，而且在特殊时刻，还在日记中写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政论。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五日所记，在录《邸抄》“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诏以明年同治元年”之下，并写了接语云：

臣慈铭曰：改号纪元，前代所慎。唐宋以来，多以法祖为义。至元顺帝欲法世祖，复号至元，则貽笑千古矣。“祺祥”二字，创见不经，奸庸不学，至于如此。今兹改元，盖欲以法世祖也。但愿圣敬日跻，官府协力。

这是咸丰死后，西太后那拉氏联合恭亲王搞政变成功，消灭载垣等顾命大臣，废去“祺祥”年号，改称“同治”时，李越缦迎合政局变化，把金殿策问式的文章，写到日记中，除云说他想

功名有些疯痴之外，还能说他什么呢？这是李越缦作为潦倒名士的可厌处，也是他的可怜处。不过他的日记文章的确是才华四溢，充满了文学韵味的。

当然，以上所举，都是诗文大家的作品，本以诗文著称，其日记有文采，原是不足为奇的。下面再举两则不以诗文名家的，也都各自有其感人情趣的日记。如明末清初人谈迁《北游录》甲午年（顺治十一年，一六四五）三月初一日记云：

三月辛卯朔，大慈仁寺伽蓝殿，海棠二株，亚韦词。烟姿猗那。贵人方席其下，亟去之。颇似汉武帝帷中见李夫人也。

这一则很短，却极有情趣，以汉武帝为喻，亦是奇想。谈迁是史学家，而文字亦极传神，使人联想到《儒林外史》中逛西湖的马二先生。

清黄小松（易）《崇洛访碑日记》中一则云：

初十日，出偃师南门，山田多井，辘轳相望，童叟熙熙，言今年麦稻棉花倍收，数十年所未有也。饭府店铺。望嵩少诸峰，愈近愈翠。登崕岭口，入登封境，即古之轘辕关，峭坡盘曲，数夫牵舆而上，回视巩洛山川，历历可数。及巅，达县城，山冈起伏，悉皆坦途，始知此境已在云霄之上。径行岩谷间，曲涧奇峰，应接不暇。

黄小松是和阮元、钱大昕等同时的金石专家，而其文字亦十分可喜，一边叙事，一边写景，读来颇有兴味。他又是画家，所以文字中也很有画意。

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从文学的角度谈一谈日记的价值，如果再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谈日记，那可谈的就更多了。因为前人的日记，不论所记何事，都是一种最朴素的、最原始的历史文

献，其可靠程度，较之加工过的史书，不知要详实多少倍。而且正史中不记录，在文献中无从查考的具体情况，在日记中常能遇到，足以印证正史，补其缺欠，其功用比录诸传闻的野史笔记更可靠，因为日记中的事不少都是亲历目睹的。下面先举一个小例子加以说明。《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记云：

初六日，辛酉，晴。病少间，强起食粥，朝夕毕一卧。始用火炉。是日肃顺弃市，囚车过门，强出观之。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

当时李越缦赁屋而居，住在宣外大街一所小有花木之胜的房子里，肃顺囚车赴菜市口，正从他门前经过。他这则日记很简单，也未加修饰，所以更朴实可信些。薛福成的《庸庵笔记》亦记此事云：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这里的“牛车”二字便是修饰之词，已失真矣。因当时北京市内交通，都是单骡轿车，平时一年四季都要上车帷子。囚车（俗名“出红差”）装犯人，或用无帷亮车，或用载物小板车，市人可以看得见。当时拉车都用骡子，找辆在当时说来十分古老的牛车倒是很少的。从这一件小事的记载上，也可以看出日记的史料价值。

再如林则徐道光十八年日记，记十月初七奉到“来京陛见，湖广总督着伍长华暂行兼署”的圣旨，十一日由武昌起身北上，十一月初十到京，当晚住东华门外烧酒胡同关帝庙。十一月初一日入宫递折、第一起召见。十二日第四起召见。十三日第六起召见，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十四日第五起召见，蒙谕“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十五日肩舆进宫，第四起召见，奉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十六日第七起召见。十七日第五起召见。十